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2006年11月　　頁79~104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孩童，還是青年？
——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梅　家　玲**

摘　要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葉聖陶一向被公認為最重要的「教育小說」作家。長篇力作《倪煥之》（1928），更被茅盾譽為「新文學中的扛鼎之作」。由於他的小說大多是自己從事教育工作經歷的不同投影，因此，《倪煥之》中青年主人公投身教育事業後的成長與幻滅，所投射出的，遂不僅是個體生命的起落軌跡，更是晚清以迄二〇年代以來，「青春／啟蒙」論述交錯於小說敘事與時代語境中的種種折變。

基於此，本文將先梳理晚清以來「青春想像」與「教育小說」與的發展，及其與西方「教育／成長／啟蒙小說」（Bildungsroman）的即離關係，繼而以葉聖陶的「教育小說」為例，觀照其間「青年」與「孩童」的糾葛互動，以及「教育」與「小說」間的曖昧弔詭，並藉以探勘二〇年代小說中，「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全文分四大部分：

一、葉聖陶及其「教育小說」的問題性；

二、「青春想像」與「教育小說」；

三、孩童，還是青年？

——二O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四、餘論：教育，還是反教育？

——葉聖陶、《倪煥之》與「青春／啟蒙論述」中的曖昧。

關鍵詞：葉聖陶　教育小說　二〇年代　青春／啟蒙論述

95.8.18收稿，95.9.30通過刊登。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現代小說中的孩童論述(II)-以「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18）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記憶與書寫：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主辦，2006年9月23-24日。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與中國文學系合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葉聖陶及其「教育小說」的問題性

葉聖陶是現代文學史上極爲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生於1894年，早年接受傳統私塾教育，1905年奉父命參加清廷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未中；次年進入蘇州公立小學，接受新式教育。辛亥革命當年，自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畢業，隨即任教於蘇州言子廟初等小學。此後，所任教過的學校遍及各大、中、小學。[1]此外，還持續編纂語文教材，頻頻發表關於教育理念的評論。三〇年代開始，他與夏丏尊等好友共同參與開明書店的編輯出版事業，針對青少年而編輯出版多種書刊，對於當時青少年的文學、文化及語文教育方面，尤多實務貢獻。[2]

葉的文學之路起步甚早，早年迫於生計，雖曾在《禮拜六》等鴛蝶派雜誌中發表過文言小說，但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便積極轉向新文學，並且成爲「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出入於新舊教育體制之中，他的寫作文、白兼具，體類遍及詩歌、散文、小說、童話、評論等，品目繁多，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受到矚目的，仍屬與「教育」有關的各種書寫。長篇力作《倪煥之》（1928），更被茅盾譽爲「新文學中的扛鼎之作」，[3]因此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一向被公認爲最重要的「教育小說」作家。

作爲堅持「爲人生而藝術」的寫實小說家，葉聖陶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的親身經歷，自然成爲他小說書寫時的主要取材來源。不少論者指出：許多關涉教育問題的短篇小說，其實都是葉從事教育工作時的不同投影[4]；長篇小說

[1] 葉聖陶所任教過的學校甚多，包括甪直五高、上海中國公學、北京大學、杭州第一師範、福州協和大學、上海大學、立達學園、開明書店函授學校等等，教學經驗豐富。關於葉的生平資料，參見商金林，《葉聖陶傳論》（合肥：安徽教育，1995）。

[2] 葉聖陶早年曾應鄭振鐸之邀，為其所主編的《兒童世界》撰寫多篇童話，現代中國的「兒童文學」，實由此開啟先河。這一系列的童話後來結集為《稻草人》，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為中國第一本自撰的童話集。由他所負責編寫的語文教材，包括《開明古文選類編》、《開明語體文選類編》、《開明國語課本》、《國文百八課》等多種。此外，三〇年代開始，他主編學生刊物《中學生》，與夏丏尊合作撰寫《文章講話》、《文心》，指導中學生習作白話文，廣受歡迎，影響深遠。凡此，皆可謂親身參與並大力推動了當時的兒童與青少年教育。

[3] 茅盾，〈讀倪煥之〉，《文學週報》第8卷（1929年7月），頁591-614。

[4] 如錢杏邨即曾指出：「他的教育小說的成就，在他的創作中是最好的。他洞察到教育的各方面，精察的解剖著教育界人物的心理，同時還注意到學生的生理狀態及其環境。他是完全的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去表現教育的實際及其各方。他是完全的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倪煥之》，乃是這些經歷的總結。事實上，正因如此，主人公青年倪煥之因投身教育事業而導致的成長與幻滅，所投射出的，遂不僅是個體生命的起落軌跡，更是晚清以迄二〇年代以來，「青春／啓蒙」論述交錯於小說敘事與時代語境中的種種折變。

而促使倪煥之成長與幻滅的原因又是什麼呢？作爲現代小說史上最早的長篇小說之一，《倪煥之》內涵豐富，敘事綿密，從一開始就贏得論者高度矚目[5]；多年來，它的相關討論始終不絕如縷。儘管評論焦點每隨時代語境不同而有所轉移，但一般而言，都把倪的挫折歸諸爲三方面：一，學校教育；二，家庭生活；三，社會革命；並且據此展開不同面向的論述。如1929年，茅盾〈讀倪煥之〉一文，首先將它定位爲一部「『有意爲之』的回憶時代氣氛的小說」，並將倪煥之的種種作爲，視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推動教育改革以及面對革命狂潮以來所遭逢的絕望與失敗」。[6]此後數十年，雖然論者大都以爲它生動地體現了當時的教育問題，並且肯定它的藝術價值，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革命鬥爭」的論述話語，仍然主宰了大多數《倪煥之》的討論。[7]八

冷靜的在開他自己所體驗到的教育病症的脈案。他是在寫著自己厠身教育界時所觀察的事件的回憶錄。他所描寫的範圍有三方面好說，一是教育界黑暗面的暴露，二是教師的生活，三是學生一方面的事件。」見錢杏邨，〈葉紹鈞的創作的考察〉，收入劉增人，馮光廉編，《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1988），頁380。

[5] 《倪煥之》的大意是：青年倪煥之原本滿懷熱忱，對於教育改革抱持著崇高理想。經由友人金樹伯介紹，來到公立高等小學校任教，與留日的小學校長蔣冰如共同實踐新式教育理念。與此同時，他結識了樹伯的妹妹：當時在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金佩璋，兩人志同道合，自由戀愛結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時間歷程的開展，不僅學校的教育改革頻頻受挫，戀愛結婚之後不久，妻子也因懷孕而失去原先的教育理想。此後，緣於五四運動、五卅慘案先後發生，倪轉而投身群眾運動和組織工作，以追求社會改造的理想。但突來的「四一二」慘案，奪去導引他走向社會改造之途的好友王樂山性命，倪也因殘暴恐怖的屠殺，深感革命理想的幻滅，藉酒澆愁，終因罹患「腸窒扶斯」（傷寒），英年猝逝。

[6] 同註2。

[7] 如錢杏邨，〈關於《倪煥之》問題〉（1930），雖反對茅盾所言「這是代表轉換期中的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但同樣承認葉聖陶於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陰暗或消極面的成就。潘懋元，〈從中國現代教育史的角度看《倪煥之》〉（1956），將《倪煥之》視為一部現實而生動的中國現代教育史資料：「不但具有教育史所具有的敘述這一歷史時期的教育情況和教育思想的一般特點，而且具有形象地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動態和反應新舊教育思想鬥爭的藝術特點」。批判「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教育思想」。金梅，〈五四前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歷程的真實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代以降，論者不再強調「小資產階級」，轉而關注其中「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形象及其心靈活動問題。[8]晚近，由於「少年論述／青春想像」的議題逐漸受到近現代文學研究者重視，透過《倪煥之》等文本去探勘晚清以來少年成長與國族想像的糾葛，遂成爲另一新興的研究路向。[9]

這些論述固然各有洞見，但卻似乎都還未能充分回應《倪煥之》一書的問題性，例如：學校教育方面，爲什麼煥之戮力於革新教育，換得的卻只是學生的「虛應故事」？家庭生活方面，爲什麼自由戀愛結婚的結果卻是「新家庭的夢幻，與實際相差太遠了」？他的挫折，除了來自於封建觀念阻礙、社會制度無法配合等一般論者已經注意到的因素外，是否還有其它更深層的原因？而作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教育小說」，爲什麼其結果竟然是青年主人公理想的幻滅、教育的不可爲？放在晚清以來，有識者頻頻謳歌「青春年少」，力主以「教育」啓蒙、以「小說」新民的脈絡中，此一現象，又該如何

照〉（1979），同樣指出該小說「通過對於倪煥之的生活以及思想演變，描繪了從五四到大革命之間的歷史面貌，以及之中一部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面貌與精神狀態」，並據此提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性格以及政治態度上的兩重性：實現理想時可以奮力以赴，理想碰壁時又悲觀失望。要克服此種情感上的弱點，就在於實行與工農群眾結合。此外，吳奔星，〈對葉聖陶創作道路的一些理解〉（1954）、曹惠民，〈葉聖陶小說的藝術特色〉（1980）、曾華鵬與范伯群，〈葉紹鈞論〉（1981），則是由藝術創作的觀點分別去論析《倪煥之》。俱見劉增人，馮光廉編，《葉聖陶研究資料》。

[8] 如趙園，〈倪煥之論〉，認為倪是「理想主義者的悲劇形象」，收入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上海文藝，2001），頁239-252。蘇敏逸，〈五四知識分子的心靈史〉藉由巴赫金「教育小說」的觀念，說明五四知識分子的心靈史與二〇年代的時代群眾和歷史的關係。見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新竹：清華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4），頁88-107。

[9]「少年論述／青春想像」的論題由梅家玲開啟研究端緒，相關論文有〈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1期（2001年6月），頁249-276、〈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臺北想像——從《臺北人》到《孽子》〉，《中外文學》第30卷2期（2001年7月），頁59-81、〈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漢學研究》第23卷1期（2005年6月），頁35-62，等多篇。其後引發不少研究者注意，如臺灣方面有石曉楓，《八、九〇年代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變》（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3）；歐美方面有宋明煒，*Long Live You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 1900-1958.*（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論文，2005）等。宋明煒論文中的"New Youth" and "Old Youth "一章，正是以《倪煥之》為中心，展開相關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解讀？

事實上，細讀《倪煥之》，當會發現：倪的挫折與幻滅，很大一部分原因，乃是來自現代啓蒙實踐過程中，「青年」與「孩童」相互遭遇之後所引發的矛盾與緊張——學童頑劣蒙昧，不堪受教，頻頻打擊著滿懷啓蒙理念的新青年；新家庭夢幻的破滅，緣於婚後妻子很快懷孕，有了孩子，原先的教育理想，遂完全被撫育孩童的瑣屑日常所取代。

如前所述，正因爲《倪煥之》被視爲二〇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小說」，而它又是葉聖陶從事教育工作時親身經歷的總結，這些情節，自然不僅是文學想像，同時也是社會現實、敘事話語與「青年」、「孩童」等文化符號多方對話的結晶，箇中曲折，值得細究。因此，以下將先梳理晚清以來「青春想像」與「教育小說」與的發展，及其與西方「教育／成長／啓蒙小說」（Bildungsroman）的即離關係，繼而以葉聖陶的「教育小說」爲例，觀照其間「青年」與「孩童」的糾葛互動，以及「教育」與「小說」間的曖昧弔詭，並藉以探勘二〇年代小說中，「青春／啓蒙論述」的折變。

二、「青春想像」與「教育小說」

（一）青春想像：「少年」、「青年」、「孩童」的發現與交錯

晚清以降，以「少年中國」取代「老大帝國」，以「幼者本位」取代「長者本位」，是爲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期盼。它所寄寓的，正是世變之中，一個積弱國族意圖從根本上除舊佈新、迎頭趕上的急切想望。落實在社會實踐與文學想像中，遂有對「少年」、「青年」及「孩童」的先後發現與高度關注。它集中體現了線性進化史觀中，對於「青春」與「新生」的迷思，以及因之而生的，堅信未來將具有無限開展性、進步性與可能性的執念。

「青春」原指春天，因其時草木繁茂呈現青綠色，故名。由於它是四序紛迴之始，孕育著自然界中無限新生的契機，因此也被轉借指涉最美好、最富於新生希望的人生時光——青少年階段。晚清以降，緣於對新興國族的高度憧憬，「少年」、「青春」等詞彙遂不斷被援引至民族國家建構的話語體系之中，召喚著無限光明的未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向來重老輕少，對於「少年」的重新發現與重視，其實是近現代特殊的文化現象。「少年」之後，也才有「青年」與「孩童」的相繼發現與彼此交錯。

1900年，梁啓超（1873-1929）假《清議報》發表〈少年中國說〉，極力表彰「少年」之於國族新生的重要性，強調去舊迎新，以少代老，是爲當時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具代表性的論述。文中不唯從多方面辨析「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關係，更藉由多種鮮明的意象對比，熱情洋溢地標舉出其間絕大差異：

>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10]

這正是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而「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11]的贊辭，亦是時人的共同憧憬。「少年中國」之說問世以來，不僅梁啓超自己要更名爲「少年中國之少年」，以「少年」自命，更成一時風潮。如《清議報》隨即出現了不少以「同是少年」、「鐵血少年」、「濠鏡少年」、「突飛少年」等爲名的作者群，或抒發壯懷，或吟歌勵志。[12]1902年，南洋公學學生組織「少年中國之革命軍」，首倡現代中國之「學運」[13]；1918年，王光祈、李大釗等人於在北京創辦「少年中國學會」，倡議「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南京、上海、成都、巴黎等地皆如響斯應，紛紛成立分會，並先後發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少年」所召喚出的激情與迷魅，由此可見。[14]

然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與傳統文化猶有牽繫的「少年」一詞漸漸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乃是新興的「青年」，箇中的文化意涵亦隨之有所轉折。[15]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陳獨秀（1880-1942）撰寫發刊詞〈敬

---

[10]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10日）。又見《飲冰室文集之五》，（臺北：中華，1960），頁7-12。

[11] 俱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10日）。

[12] 如《清議報》44期刊有「鐵血少年」之〈壯志〉，89期有「突飛少年」之〈勵志歌十首〉。39期刊有「同是少年」之〈寄少年中國之少年〉。餘以「少年」為名者，分見57、86、88等期。

[13]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革》（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頁74-76。

[14] 「少年中國說」的相關論述研究，參見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1期（2001年6月），頁249-276。

[15] 這裡所謂的「取代」，係針對文化意涵的轉變而言。為「少年中國」所憧憬的「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告青年〉，開篇以「初春」、「朝日」等譬喻，彰顯「青年」的新鮮活潑，希望無窮；乍看之下，實不無取法並承繼〈少年中國說〉之處：

>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16]

不過，論及青年應有的自覺自任，〈敬告青年〉提出六項期許：「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所呈現的，已是新文化運動的具體訴求，其轉折新變處，實明顯可見。據錢穆（1895-1990）先生所言：

> 青年二字，亦為民國以來一新名詞。古人只稱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而猶必為新青年，乃指在大學時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識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國以來之新名詞，而尊重青年亦成為民國以來之新風氣。[17]

如此，則「青年」一詞的出現，一方面標示了民國與晚清的區隔；另一方面，所謂的「新青年」，更以其「在大學時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識」，成就了自我的特殊身份，不僅成爲傳統文化的對立面，並且具有教育社會，啓蒙大眾的能力與責任。五四前後，《新潮》、《新青年》等種種以「新／青年」爲名的刊物及團體紛紛應運而生，並且以救亡啓蒙爲己任，正是職此之故。新文學運動以來，文學文本中每以各式青年人物爲主人公，並以他們的依違掙扎，演義新中國的艱難走向。「青年成長」與「國家成長」，於是在現代文學想像中

年」，其實是泛指一切青春希望的修辭符號，與實際的生理年齡關係不大。因此，晚清小說家吳趼人一度以「中國老少年」為筆名，「老少年」並曾進入他的《新石頭記》中，成為重要角色。五四之後，「青年」取代「少年」而成為新興的「青春希望」象徵，「少年」一詞，遂落實為指涉具有一定生理年齡限制的人生階段。這也說明瞭，何以二、三〇年代起，如《開明少年》、《少年雜誌》等刊物皆以「少年」為名，但讀者群已不再是普遍的社會大眾，而是中學生。

[16]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卷1號（1915年9月15日）。又見《獨秀文存》卷1，頁1。

[17]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互爲表裡，成爲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

在此前後，傳統文化中向來忽略的「孩童」，也隨之浮出歷史地表，成爲論者關切的焦點。早在1913年，周作人（1885-1967）即發表〈兒童研究導言〉一文，率先指出兒童有別於成人：「蓋兒童者大人之胚體，而非大人之縮形。……世俗不察，對於兒童久多誤解，以爲小兒者大人之具體而微者」。[18]隨後，又藉由討論藝術教育，表達了「兒童本位」思想：「蒙養之要，不在理論而在方術。欲通其術，要當以兒童爲師而自求之.……故今對於徵集成績品之希望，在於保存本真，以兒童爲本位」。[19]五四以來，隨著對於「人的文學」的重視，以及批判傳統「三綱」——尤其是「父爲子綱」之說，周作人、魯迅（1881-1936）等都特別針對「孩童」問題多所論述。1918年，周作人〈人的文學〉一文於《新青年》刊出，從重新發現「人」的角度，同時表達對婦女與兒童的關注。之後，並提出「子孫崇拜」之說，進一步主張：

> 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為自己崇拜——子孫崇拜。[20]

1919年，《新青年》刊出魯迅名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他以「幼者本位」爲思考核心，以爲「孩子自有其世界，並非縮小的成人世界」：

> 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於孩子的發達。……
>
> 希望覺醒的人，應該洗淨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力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做幼者本位的道德。[21]

不止於此，雜文如〈二十四孝圖〉、〈看圖識字〉等，都表達了魯迅對當時整個社會環境中兒童處境的焦慮與關懷。被視爲新文學里程碑的小說〈狂人日記〉，更在大力批判舊社會「吃人」的最後，以「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作結，顯示了「孩童」在魯迅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吶喊》、《徬徨》之中，不少小說都有孩童身影出沒；二〇年代，文學研究會發

[18] 周作人，〈兒童研究導言〉，《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3號（1913年12月15日）。又，關於周氏兄弟之「孩童觀」，歷來論者多以為周作人受到魯迅影響，但實際的情況是：魯迅的許多觀點都承自周作人。參見朱自強，〈周作人：中國兒童文學的普羅米修斯〉，《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浙江：少年兒童，2000），頁206-294。

[19] 〈學校成績展覽會雜記〉，《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10號（1914年9月20日）。

[20] 周作人，〈祖先崇拜〉，《每週評論》第10期（1919年2月23日）。

[21] 俱見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第6卷6號（1919年11月1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起「兒童文學運動」，既爲兒童書寫專屬的文學作品，也讓兒童大量進入所書寫的各類文本之內。三〇年代，左翼思潮蔚興，孩童同樣成爲文學想像中的要角。擺盪於新舊文化交接處，他們彼此對話，相互參映，投射出的，正是「發現孩童」之後，「孩童」出入於不同話語體系中的駁雜形象。[22]

綜上所述，自從「少年」、「青年」、「孩童」三者陸續被「發現」（或「發明」）之後，他們不只持續參與現代文學／文化的想像形構，並且成爲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要角。此一現象，實爲二十世紀文學與文化所特有，重要性固不待言。整體看來，三者固然同爲因應世變而生，但被賦予的文化意涵卻略有參差。基本上，「少年」與「青年」出現的時序雖有先後，但兩者都是當時中國「青春想像」的人格化表達，喻載著整個社會除舊佈新、經歷巨大轉型時的政治與文化能量，也是推動種種現代化革新方案的核心象喻，召喚著嶄新的社會、文化、政治想像範式。[23]所不同者，「青年」在身經「新」文化洗禮下，無論是作爲具體個人抑是文化符號，都被賦予了更多現代的知識性內涵，並具有文化啓蒙的自覺與自任。相對地，「孩童」的發現植基於對「人」的尊重與肯定，無論是「子孫崇拜」抑是「幼者本位」，「保存本真」——也就是尊重孩童的自我發展，大致是其一般共識。

也因此，五四以來，對於「青春」的想像往往與「啓蒙」意識相表裡——無論是自我啓蒙，抑是啓蒙他人，青春都因啓蒙而得以日新又新，啓蒙也因青春而更具開展性。因之而成的「青春／啓蒙論述」，因此不僅爲青少年所獨擅，並且隱含了線性的發展過程，需要時間歷程來完成。

但耐人尋味的是，「青春」之所以成爲晚清以來最有力的激情符號，正是因爲它以進化論爲基礎，在線性時間軸上許諾了一個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未來；這個未來，必須憑藉「新生」的憧憬，不斷建構與重構。無獨有偶，放在實際人生歷程中，「孩童」是爲人生之初始，較諸「青／少年」，「新生」的特質更爲鮮明。如此，它是否也同樣載喻了時人對於新國家、新社會的諸般憧憬？當青年們展開文化啓蒙的教育實踐時，是否也要爲孩童「保存本真」？「青／少年」與「孩童」之間，要如何相互定義、彼此對話？

---

[22] 有關魯迅的孩童論述，參見顏健富，〈「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漢學研究》第20卷2期（2002年12月），頁301-325。二、三O年代孩童論述的相關問題，則參見王泉根，《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第四章〈二十年代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第五章〈三十年代兒童文學的左翼思潮與「革命範式」〉。頁40-72。

[23] 有關清末以來「青春想像」的相關問題，參見宋明煒，〈從「少年中國」到「老少年」——清末文學中的「青春」想像及其問題性〉，未刊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回顧孩童論述的發展，五四時期固然強調「保存本真」，然而，「孩童」卻是從被「發現」的那一刻起，就負載了遠比「青年」更多的未來可能性，因此形象益顯曖昧複雜。基本上，「新生」召喚出「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的期盼，但「救救孩子」的吶喊，卻也使孩童一開始便落入了「被拯救」的位置，意謂著被動與等待。事實上，孩童較諸「青／少年」幼小，成長過程中猶多需長者養育提攜，此一生理現實，原就大幅降低了它與長者間的對峙抗爭，並增益其爲外力左右的可能性。孩童的「教育」問題，遂因此在「拯救」的過程中，成爲各方角力的重點。以魯迅爲例，身居「父親」的發言位置（〈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所透露的心態便相當複雜。他視孩童爲子女，強調「對於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固然表明了以幼者爲尊；但「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此一期待，則使他既主張對孩子「理解」、「解放」，不加干擾，仍不忘要從旁「指導」，以期「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24]

另一方面，「少年」與「青年」雖都是當時中國「青春想像」的人格化表達，然而論及所涵攝的喻意，「少年」明顯要廣於「青年」——作爲「中國」自我命名的嶄新修辭符號，他既有初春朝日般的蓬勃氣象，得以開展挑戰老朽、啓蒙社會的「青年」事業；又因在人生階段中去童年未遠，也容易與新生純真的「孩童」形象接軌。「青年」—「少年」—「孩童」三者勾連匯通，所投射出的，正是一個集無限希望、力量與可能性於一身的新興主體，寄託著古老帝國去舊迎新的所有想望。然而可見的是，五四之後，原先修辭性的「少年」意象逐漸明確具體，在落實爲人生中的某一特定階段的同時，原來曾經兼攝於「少年」意象之中的「青年」與「孩童」，也開始分化。不僅指涉的人生階段不同，所載喻的文化內涵與激發的能動性也截然有別。新文化運動爲「青年」形塑了汲取新知、勇於進行種種啓蒙改革的知性形象，並召喚出社會個體勇於實踐的熱情。「孩童」雖因「幼者本位」的理念而被「發現」，並且同樣成爲民族國家未來的希望所繫，但「幼者／孩童」與「青年」之間，畢竟相隔著一道由生理時間所造成的鴻溝，無法踰越。如此一來，同樣肩負打造新國家的殷切期盼，幼弱的孩童要如何才能長成爲強健奮進的新青年？當新青年戮力於各項實際的啓蒙工作時，他們是以何種姿態，回應孩童的教育需求？教育孩童、啓蒙大眾與新青年的自我成長啓蒙之間，又將發生怎樣的互動？這一系列問題，影響牽動的不僅是社會現實，更爲文學想像所長期關注。晚清以來，小

[24]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第6卷6號（1919年11月1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一直被視爲新民救國的重要憑藉，其中的「教育／成長小說」，更因涉及青少年的成長啓蒙經驗，因此直接涉及到此一論題。

（二）「教育」、「小說」與「教育小說」

「教育小說」源自歐西，是清末民初新興的小說類型之一。在當時一片域外小說的翻譯熱潮中，雖非熱門體類，卻因其中濃厚的「教育」意義，受到一定重視。尤其，在梁啓超倡議以「少年中國」取代「老大帝國」，鼓吹「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興一國之小說」、「以小說教小學」的理念之下，「小說」開始被賦予「小學教育」的功能，「教育小說」大多以少年人物的成長奮鬥爲中心情節，其譯介與改寫，因此更受矚目。

「教育小說」在晚清時被正式引進與譯介，實與當時旨在倡議「教育」的各種雜誌頗有關聯。1903年，羅振玉創辦《教育世界》，即以「教育小說」的名目，連續五期，譯載了小說《愛美耳鈔》（即盧梭《愛彌兒》）[25]，是爲中國譯介西方及日本教育小說之始。其後商務印書館創辦《教育雜誌》，刊載各類教育論述與實況報導，同時也闢有「教育小說」專欄，由當時著名的文化人包天笑負責譯述，長期連載。如《馨兒就學記》（*Cuore*，即《愛的教育》）與《苦兒流浪記》（*Sans Famile*）等名著，都出於此。「教育小說」之所以能於清末民初推廣流佈，成一體類，《教育雜誌》及包天笑等「新型文化人」的推介之功，實不可沒。[26]

然而，當時被歸屬在「教育小說」名目之下的小說，內容其實相當駁雜。要言之，約可區分爲三：一，鎖定以青少年人物爲主角，內容或聚焦於學校的學習生活，或強調自我的成長奮鬥（如《馨兒就學記》、《苦兒流浪記》等）。二，採寓言、科幻等形式，其主角人物不限於少兒，體類則接近現今所謂的「兒童／少年文學」（如《病菌大作戰》）。基本上，這兩類皆是以淺近

[25] 即*Emile Ou L'education*，原作者為Jean-Jacuuues Rousseau，1762年出版，連載於《教育世界》53-58號，署法國約翰若克盧騷著，日本山口小太郎、島崎恆五郎譯，日本中島端重譯，篇首前有美國維廉彼因撰〈《愛美耳鈔》序〉及盧騷〈自序〉，卻未標明中譯者。

[26]「新型文化人」之說，見熊月之，〈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匯聚〉，《近代史研究》第100期（1997），頁257-272。所指的，乃是科舉廢除後，匯聚到 大都市（主要是上海）裡來找尋自己新的社會位置的一群讀書人。他們來自各地鄉鎮，舊學根基普遍深厚，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蘊，得以藉此謀生。除包天笑外，曾從事教育小說之譯作者，至少還有劉半儂（農）、畹滋、（徐）卓呆、（張）毅漢、冷（陳景韓）、索驥等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言改寫的譯作，撰作目的在於提供少年童子閱讀，藉以發揮教育功能。至於第三類，則係清末民初的文人自著，採白話章回體，所著墨者，多爲當時教育界的亂象，內容雖關乎教育，甚至以「教育」名篇，其要旨卻並不在教育青少年（如《未來教育史》、《學究新談》等），而是爲了投射一己的嘲謔與狂想。[27]

五四以後，隨著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原先體類駁雜的「教育小說」，其文類界限、敘事形式與內涵也都相應有所變化。章回體不再、白話取代文言，這些形式上的改變固然顯而易見，但文類特質的調整，無寧更值得注意。其中，「爲孩童／青少年而書寫」，與「書寫孩童／青少年」的小說已明顯區隔。基於「幼者本位」，前述一、二類主題的小說，是「爲孩童／青少年而寫」，二〇年代開始，已自成一「少兒文學」之體類，新文學作家不僅大量譯述歐西之作，並嘗試創作，爲中國孩童書寫屬於自己的文學。另一方面，小說家們延續前述第三類的書寫關懷，持續關注新舊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教育問題，發而爲文，卻是化狂想爲寫實，以憂思取代嘲謔，於是從魯迅以降，孩童與青少年，每每成爲現代小說中的重要主人公，並被寄託著國族未來的憧憬。此時，真正合於歐西「成長／教育／啓蒙」小說（Bildungsroman）特質的作品，也逐漸在中國現代小說家筆下出現，具有「現代」意義的「教育小說」，於焉成型。換言之，二〇年代以降的「教育小說」，內涵已不同於晚清，它應是在排除「少兒文學」之後，以「書寫孩童／青少年」爲主軸，且意圖著墨於各種「教育」問題的類型小說，主人公兼括孩童與青少年。其中，著眼於書寫青少年成長過程者，又多少受到西方小說「Bildungsroman」的啓發，意圖揭示「成長／啓蒙」的意義。因此，此一聚焦於青少年成長過程的類型小說，遂自然融匯於晚清以來的「青春／啓蒙論述」之中，共同投射著當時社會中的「青春想像」。

三、孩童，還是青年？——二〇年代「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回到以「教育小說」著稱的葉聖陶。綜觀葉的小說創作，「孩童」與「青年」一直是關懷重心，屬新文學創作者，其敘事又大多圍繞於各類「教育」議

[27] 有關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介及其相關問題，請參見梅家玲，〈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2006），頁81-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題，被視爲代表性的「教育小說」作家，自是良有以也。尤其是「孩童」，他應是現代小說作家中，書寫孩童最多的作者。以他爲例，不僅可見新文化運動以來，「青春／啓蒙論述」的開展軌跡，更可就其間「青年」與「孩童」的互動糾葛，探勘此一論述的轉折遷變。

（一）青春萬歲——《倪煥之》之前的「新青年」與「孩童」

葉聖陶的創作跨越五四前後，隨著新舊文學轉型，以及「教育小說」之體類的自我調整，他的書寫取材與敘事語言也有明顯出入。大體而言，早期文言小說中，「孩童敘事」與「青年敘事」多屬各別發展，不見交會；其青年主人公，若非窮愁潦倒，便是言情浪漫，並無任何文化啓蒙的自覺自任。進入新文學創作階段後，青年與孩童，則多有經由師生或親子互動模式出現者。起初，這些互動乃是分別散見於不同的短篇；不久後，它們便在《倪煥之》中得到匯整，《倪煥之》所以成爲葉聖陶，以及二〇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小說，自當不是偶然。

早在以文言寫作階段，葉便有不少著墨於孩童言行的小說，如〈一貧一富〉（1915）寫貧家子熱愛國家，積極籌儲愛國儲金，樂讀《小軍人》之書，「自學校歸，歌〈勸用國貨〉之歌」。[28]〈良心上之敵愾〉（1915）寫滬上小學生仇日，群毆日生，被老師訓誡之後，立志長大後報國，並且慷慨陳詞：

> 「我輩良心上之敵愾實自主之。先生嘗詔我，父母亦嘗命我，謂爾輩將來必當為強毅勇敢之國民。我輩則銘之肺肝，無敢一刻忘。近日以還，我輩聆父母之談話，鄰舍之議論，乃知東家之子侮我已甚，而吾國人低首下心，曾不攷一校，是直卑怯之行耳。寧復成強毅勇敢之國民？我輩雖在稚齡，引為深恥，爰集志同道合之愛友，為同仇敵愾之先聲。」[29]

這類書寫，基本上延續了晚清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想，體現的是崇尚「軍國民」精神的風氣，學校教育，遂亦成爲此一精神的養成所。[30]五四以後，葉明

[28]〈一貧一富〉，原載《禮拜六》64期，後收入《葉聖陶集》1（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43-48。

[29]〈良心上之敵愾〉，原載《禮拜六》63期，後收入《葉聖陶集》1，頁38-42。

[30] 據商金林之說，葉於1907年考取新創的草橋中學，其時清廷行軍國民教育，上軍訓課，一年樂事，以秋季旅行為最，葉每唱行軍歌以鼓舞士氣。《葉聖陶傳論》（合肥：安徽教育，1995），頁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受到「幼者本位」等新式教育理念影響[31]，對孩童的觀照面向大爲不同，筆下每每有意凸顯孩子純真自然的本性。學校的制式教育，以及世俗化的成人期待，因此顯得扞格無謂。如〈一課〉（1921），描寫小學生雖然身在課室，但心繫自己悉心餵養的小蠶，以及窗外飛舞的蝴蝶。對比於鮮活的小蠶與豐富的自然界，教室內的正規自然課程，因此益顯枯燥貧乏。[32]〈馬鈴瓜〉（1923）敘述孩子奉家長之命上貢院赴考，念茲在茲的，不是如何爭取金榜題名，卻是隨身帶來的馬鈴瓜的可口美味，亟欲草草結束考試，一快朵頤。[33]而〈萌芽〉（1921）描述年輕母親懷孕，滿懷感動，也觸及了當時社會對於新生命的期盼。

與此同時，早期文言小說中窮愁潦倒、言情委婉的舊式男女不再，取而代之的，乃是滿懷啓蒙理想與教育熱忱、勇於抗爭舊勢力的「新青年」。〈城中〉（1925）所敘述的的青年丁雨生，可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一心回鄉辦學，引進新教育，面對古舊的城池，心裡想的是：

> 這古舊的城池，究竟是很可愛的。雖然像老年人的身體一樣，血管裡流著陳舊的血液，,但是我正要給它注射新的血液，把那陳舊的擠出來，使它回復壯健的青春。到那時候，裡邊流著的沒有一滴不是青春的血。

接受青年同志會邀請，以《改造社會》爲題演講，更大力宣示：

> 身體裡面有了老廢的質料，就得排泄出去；血管裡面有了汙濁的血液，就得重新化清。一個社會的情形正同身體相似，所以要講改造社會，應該排去社會裡的老廢物，讓社會的血管裡滿滿地流著新鮮的血液。[34]

如此強調迎新去舊，召喚青春，自然引發同鄉耆舊的強烈反彈。然而雨生堅持

[31] 據《葉聖陶傳論》（合肥：安徽教育，1995），葉深受新文化運動感召，並且身與其役。1915年《青年雜誌》刊印於上海，葉每期必讀；1918年，與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俞平伯書信往來頻繁，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1919年初，向《新潮》投稿〈這也是一個人〉（後改名為〈一生〉）。三月，更由顧頡剛介紹，正式加入新潮社。分見頁187-190；頁213-220。

[32] 〈一課〉，原載《晨報副刊》，後收入《葉聖陶集》1（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194-199。

[33] 〈馬鈴瓜〉，原載《時事新報．雙十節增刊》，後收入《葉聖陶集》2（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94-110。

[34] 〈城中〉，原載《民鐸》7卷1號，後收入《葉聖陶集》2（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11-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理想，毫不屈服，誠然是五四新青年的本色。另如〈搭班子〉（1926），敘述青年澤如被任命爲小學校長，除亟思援引同道，一起「搭班子」之外，對於孩童教育更有具體理念：

> 校園一定要把它搞得頂好，不單是玩賞園，簡直就是個豐美的自然。讓兒童們生活在裡頭，有如魚生活在水裡，勞作是必須訓練的，可以教他們種花，剪樹……[35]

在此，「教育」被視爲重獲「青春」的不二法門；校園則是協助孩童生成的豐美自然。這一類的「新青年」，結合了純真自然的孩童，體現的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興氣象。

（二）教？不教？怎樣教？——當「青年」遇上「孩童」

然而，無論是意欲去舊迎新的〈城中〉，抑是一意爲孩童經營理想受教環境的〈搭班子〉，其敘事都還僅停留在以熱情憧憬未來的「理想」階段，至於實踐過程及結果如何，則並未觸及；而這卻正是可能衍生問題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參照葉聖陶其它的短篇，便會發現：在彰顯教育之理想性的同時，社會現實的陰影，以及「青年」與「孩童」、老師與學生之間可能的緊張關係，其實也已蓄勢待發，若隱若現。1921年，葉聖陶先後發表〈飯〉、〈義兒〉與〈風潮〉三篇小說，即分從不同面向，呈現出學校師生之間的疏離不諧。[36]〈飯〉敘述爲師者迫於生計，爲稻粱謀，一群頑童爲此嘲弄老師，不料意外識得飢餓與死亡的恐懼；〈義兒〉中的孩子擅長作畫，老師不以爲然，不斷打壓；〈風潮〉更是直接揭露了學生與老師間的角力，小說中的歷史教員與學生發生衝突，學生考試拒不作答，與老師抗爭，並以引發「風潮」而自誇自得。無可否認，這些情節的發生，必然有其社會現實的背景。它的指向，乃是當青年遇上孩童之後，必須面對的問題：教？不教？怎樣教？

這些問題，不久後便在《倪煥之》中，得到全面呈現。1927年，《倪煥之》在《教育雜誌》「教育文藝」欄目，展開爲期一年的小說連載。是爲新文化運動以來，《教育雜誌》所刊載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現代」長篇教

[35]〈搭班子〉，原載《教育雜誌》第18卷5期，後收入《葉聖陶集》2（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71-280。

[36]〈飯〉原載《時事新報・雙十節增刊》，後收入《葉聖陶集》1（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36-243；〈義兒〉原載《文學旬刊》18期，後收入《葉聖陶集》1，頁244-252；〈風潮〉，原載《教育雜誌》第14卷4期，後收入《葉聖陶集》1（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83-2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育小說，意義不凡。[37]它不僅包羅了此前各短篇所觸及的重要教育論題，而且以長篇形式，使它們得以在一時間歷程中循序開展，讓個人參與並見證時代的鉅變，呈現了「史」的規模。[38]不過，承前所述，本文不擬再討論過去已多所論及的個人與歷史時代等問題，而是將它置於「青春／啓蒙論述」與「孩童論述」交會的脈絡中，探討其間的問題性，並試圖由「教育小說」的敘事特質，爲倪煥之這位「新青年」的挫折與幻滅，提出另一觀照面向。

基本上，晚清以「少年」爲中心所開展的「青春想像」，著重的是「青春」所內蘊的激情動能，以及所投射出的新生希望；五四以後的「新青年」，則因「知性」特質使然，更強調教育啓蒙方面的自覺與自任。倪煥之的「青春／啓蒙」歷程，於是不僅在一連串「新」與「舊」的頡頏交錯中開展而出，並且兼具了自我啓蒙與啓蒙他人的雙重質性。但不幸的是，無論在孤掌難鳴的鄉間小學校，抑是與同志共同努力的公立高小，這位一心想要實踐新教育的「新青年」，都在面對「孩童」，也就是他所教導的學生時，不斷受到挫折。

小說一開始，便是敘述倪煥之的去舊迎新——離開令他失望的鄉間學校，轉赴另一具有新式教育理念的小學，與同具改革理想的校長蔣冰如共同展開全新的教育實踐。他對鄉間學校的失望，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正是源自於孩童，也就是所面對的學生：

> 他又覺得那些小聽眾太不可愛了。他所教的原是低年級，最大的學生也不過十歲光景，與又粗又高的殿柱對比，更見得他們微小。兒童的愛嬌，活潑，敏慧，仿佛從來不曾在他們身上透過芽，他們有

[37]《教育雜誌》創刊於1909年，首期即闢有「教育小說」欄目，由文化名人包天笑長期負責譯述，直至1919年底告一段落。除了後期《青燈回味錄》（1914-1917）是包天笑自著的白話章回體小說外，其它一律都是以淺近文言譯述的長篇域外小說，性質上屬於晚清小說遺緒。1919年新文化運動展開，白話取代文言，實為大勢所趨。《教育雜誌》的內容與語言，乃隨之革新。包天笑負責的「教育小說」所以突然中止，當與此有關。此後數年，《教育雜誌》所刊載者，全屬教育性的論述，間或有冠以「教育文藝」之名的「現代」文學性篇什刊出，也只是域外的童話翻譯或短篇小說創作。葉聖陶的《倪煥之》，是新文學運動以來，該雜誌所刊登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創作，因此意義不凡。

[38]如茅盾，〈讀倪煥之〉即指出：儘管「五四」風雲動蕩，但之後的文壇，並沒有隨即出現能夠表現此一時代性與社會性的文學作品。《倪煥之》則是「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壯潮所激盪，怎樣地從鄉村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的是奸詐，呆鈍，粗暴。街頭那歪戴著帽子，兩手插在對襟短衣的口袋裡，身體一斜一轉的，牙齒緊咬，預備一放開時就吐出一句惡毒的咒罵的流氓的典型，在他們裡頭似乎很可以找出幾個。
>
> 煥之起初也想，別的不用管，自己教的是學生，就從學生裡頭尋點安慰吧。但不久便證明這只是妄想。他叫他們靜聽不要響，他們卻依然說笑，爭罵；他聽見自己求救一般的講說的聲音，同時總伴著各種噪音，甚至自己的聲音反而消沉在噪音裏。他沒法，只好停嘴。學生們起初覺得異樣，像夏雨收點一般零落地住了聲。但隨後就是一陣帶著戲弄意味的笑。這使煥之發怒了，便把教鞭揚起來，想在不論哪一個身上亂抽一頓（兩個夥伴常常這樣做，在當時似乎頗有點效驗），然而手還沒有這種習慣，要抽下去仿佛很不順，半路裡縮住了。只剩又憤慨又悲哀地喃喃斥罵：「討厭的小東西！」[39]

同被視爲國家民族未來希望所繫的「孩童」，竟然是「新青年」眼中「討厭的小東西」，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所以如此，或許初步可以歸咎於任教學校的校舍師資條件不佳，以及孩童受限於傳統舊習，難以立即接受新教育等因素。[40]然而，即或當他來到新環境，與志同道合的校長共同「爲兒童布置一種適宜的境界，讓他們自己去尋求，去長養」，期待看到的「全是天真純潔的孩子，體格建壯而優美」；其結果，卻仍然令人沮喪：他讓學生將小說改編爲戲劇形式排練演出，學生不感興趣，「倦怠與玩忽都來了」；他苦心經營實習農場，希望藉此「培養他們處理事務應付情勢的一種能力」，不料看到的卻是：

> 學生們拿著應用的農具在農場上徘徊，看看這裡那裡都不用下手，只好隨便地甚至不合需要地澆一點水完事。又看見他們執著筆桿寫《農場日誌》，帶著虛應故事的神情，玩忽地塗上「今日與昨日同，無新鮮景象」的句子。他們熱烈的興致衰退了，懇切的希望鬆

[39]《倪煥之》，輯入《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3。

[40] 煥之初次任教的學校，「校舍是一所陰森而破舊的廟宇。大殿是一個課堂，兩廡各是一個課堂。中庭便是運動場。三個課堂裡一律是黑漆轉為灰白色的桌椅，墻上的黑板顯出橫條的裂紋。沈寂，幽暗，寒冷。尤其是那大殿，高高的藻井，糾結著灰塵，和蛛網，好像隨時可以掉下一條蛇或者一個鬼怪來似的」。第一天當教員，「正是個陰沈的雨天。走進那廟宇，只見許多孩子在中庭裡亂竄……」。幾個十五六歲的學生，「正站在教桌上唱不成腔的京戲」。《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懈了；「今天要農作，但農作有什麼事做呢！」[41]

較諸先前，在此倪煥之的挫折無寧更令人深思：學校的環境改善了，學生的稟性素質也令人期待，但爲什麼革新教育的理念仍然無法達成？青年對於孩童仍然無計可施？「他們需求的是天天變換的新鮮，而植物的生命過程卻始終在潛移默化之中」——經由農場教育的挫敗，《倪煥之》喻示了當時教育啓蒙／生命成長，以及現實需求之間的緊張性：孩童的生命成長與教育啓蒙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歷程，面對亟求新變的人心，以及急劇變動的社會現實，顯然緩不濟急。

此一現象，其實也揭露出晚清「青春想像」與五四「青春／啓蒙」論述之間的罅隙：「青春」固然令人嚮往，但青春的境界卻未必能夠一蹴可躋；尤其五四以來，以杜威學說爲主的經驗主義教育論，主導了體制內教育工作的走向，著重「日常時間」的經驗教育，成爲通往青春啓蒙之途的必經歷程[42]，對於成長中的孩童來說，期待「天天變換的新鮮」，固然每不可得；新青年啓蒙實踐的熱忱激情，同樣因難收立竿見影之效，而逐漸銷磨殆盡。

再者，論及倪煥之的第二重挫敗，雖然一般都將重點放在他婚姻家庭生活的未盡如意，但追根究柢，問題仍然源自於孩童，以及因之而來的瑣屑日常——倪與妻子金佩璋結合，原是基於教育理念上的志同道合。婚前由自戀愛，婚後共同致力於新教育，這是五四以來，多少青年心嚮往之的人生追求。不料，婚後的于飛之樂，硬是被自己孕育的新生命所破壞——妻子懷孕之後，她便「留在家裏，不再關心學校的事」；以致於，

> 家庭裏所見的是摘菜根，破魚肚，洗衣服，淘飯米，以及佩璋漸漸消損的容顏，困疲偃臥的姿態等等，雖不至於發生惡感，可也並無佳趣。談起快要加入這個家庭的小生命，當然感到新鮮溫暖的意味；但一轉念想到所付的代價，就只有暗自在心頭歎氣了。
>
> 他得到一個結論：他現在有了一個妻子，但失去了一個戀人，一個同志！幻滅的悲涼網住他的心，比較去年感覺學生倦怠玩忽的時候，別有一種難受的況味。[43]

---

[41] 《倪煥之》，《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125。

[42] 這一點，在葉聖陶的小說中即明顯可見。《倪煥之》第21節，曾敘述倪的朋友王樂山對於奉行杜威主張的批評：「你們的方法太瑣碎了，這也要學，那也要學，到底要叫學生成為怎麼樣的人呢？」《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197。

[43] 《倪煥之》，《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止於此，小生命出生後，妻子更是忙於育兒，無暇他顧。「走進屋內，一種潮濕霉蒸的氣味直刺鼻管，小孩的尿布同會場中掛的萬國旗一樣，交叉地掛了兩竹竿」，這樣的生活，不僅使倪煥之深深覺得「新家庭的夢幻，與實際相差太遠了」，更要怨嘆「命運太快地讓孩子闖進他們的家庭裡來了，孩子一來，就奪去了她的志氣，佔有了她的心思和能力」。爲此，倪甚至假想：「如果這時候還沒有孩子，情形或許會完全不同，她既有嚮往教育革新的意願，未必不能徹悟到教育以外的改革吧」。[44]

至此，孩童還不僅止於是「討厭的小東西」而已，他甚至是剝奪女青年志氣能力的罪魁禍首，是新青年從事啓蒙革新的絆腳石。當「青年」遇上「孩童」，所面臨的，遂不僅是「教？不教？怎樣教？」的問題，更進而觸及到生養與否的矛盾，和如何生養的困境；而著眼於「時間」上的急迫性，正是箇中關鍵。往前追溯，此一「孩童，還是青年？」的矛盾，晚清時即可見端倪。據《新民叢報》載，當時主張女權的奇女子吳孟班，曾在結婚懷孕不久後，自行墮胎，面對丈夫質問，她的回應是：

> 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45]

「孩童」的養成需時二十年，「青年」的自我的養成則只要五年，爲求「時效」，寧可捨子而全己，如此行爲，固然不無過激之嫌，卻也從另一角度，說明青年與孩童兩者間的緊張關係，原是其來有自。無獨有偶，當年留美歸來，曾在胡適力薦下，成爲北大第一位女性教授的陳衡哲（莎菲），也曾以孕而輟教，使胡適爲之慨嘆不已：

> 莎菲因孕後不能上課，他覺得很羞愧，產後曾作一詩，辭意甚哀。莎菲婚後不久，即以孕輟學，確使許多人失望。此後推薦女子入大學教書，自更困難了。當時我也怕此一層，故我贈他們的賀聯為「無後為大，著書最佳」八個字。[46]

---

[44] 《倪煥之》，《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182、218。

[45] 〈道聽塗說〉，《新民叢報》3號，1902年3月。隨後，《女報》（後更名《女學報》）在上海問世。創刊號的「新聞」欄中，亦有〈嗜學墮妊〉一則，記述此事，頗引起當時輿論界議論。此處轉引自夏曉虹，〈吳孟班：過早謝世的女權先驅〉，預訂刊於《文史哲》2007年第2期。有關吳孟班的生平事蹟考掘，亦請參見該文。

[46] 此為胡適1921年9月10日的日記所錄，見《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臺北：聯經，2004），頁310-3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文化運動中，鼓吹新教育最力的胡適，在好友任鴻雋與陳衡哲結婚時，所致贈的賀聯竟然是「無後爲大，著書最佳」——這是對新教育的期許，還是反諷？是對未來的詛咒，還是先見之明？

（三）「日常時間性」的消亡與「青春／啟蒙論述」的折變

重視「時效」的另一面，其實是「日常時間性」的消亡，也是「青春想像」由原先「教育／啓蒙」開始往「革命／啓蒙」的轉向。原本呈線性發展的時間，因此被迫以片斷、跳躍的方式行進；其指向，正是激情昂揚，期盼一蹴而成的革命事業。小說最後，參與社會革命受挫的倪煥之罹患「腸窒扶斯」，行將辭世，彌留間，恍惚見到自己的孩子繼起接棒，適所以說明此一敘述時間的跳躍性：

> 他看見無盡的長路上站著個孩子，是盤兒。那邊一個人手執著旗子跑來，神色非常困疲，細看是自己。盤兒已作預備出發的姿勢，蹲著身，左手點地，右手反伸在後面，等接旗子。待旗子一到手，他就像離弦的箭一樣發腳，絕不回顧因困疲而倒下來的父親。不多一會兒，他的小身軀只像一點黑點兒了。在無盡的長路上，他前進，他飛跑……[47]

儘管教育孩童時沮喪厭惡、生養孩童時矛盾不甘，但當這位新青年壯志未酬，鬱鬱以終之際，所期待的，仍然是孩童的繼往開來。只是，孩童如何長成接棒的中間過程，卻硬生生地被抽離、省略了。

循此，我們似乎也不難明瞭，三〇年代以後，此一著墨於「教育／成長」（Bildungsroman）的類型小說，何以會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難以爲繼——因爲，無論是「教育」，抑是「成長」，其完成，都有賴於「日常時間性」的積累[48]；一旦抽離，「啓蒙」便只能以靈光乍現的姿態，開啓當下的頓悟。而當它與革命的激情相偕並隨之後，「孩童，還是青年？」遂不再成爲必須取捨的選擇題，因爲，經由「教育／啓蒙」到「革命／啓蒙」的折變，二者因生理時間差異而發生的矛盾齟齬，已然消弭於無形，並且又重新交融匯整，共同形構出新一代的「青春想像」。

---

[47] 《倪煥之》，《葉聖陶集》3（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270。

[48] 「日常時間性」的說法，參見Richard A Barney, *Plots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the Novel in Eighteen-Century England*,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頁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餘論：教育，還是反教育？——葉聖陶、《倪煥之》與「青春／啟蒙論述」中的曖昧

回顧「青春想像」的萌興，乃是源起於「少年中國」的想望；其要旨之一，便是落實於革新的少年教育。而在「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的理念下，此一少年教育，又得要憑藉小說來完成。晚清以來，「教育小說」的引進、譯介與摹寫，莫不與此相關。但經由葉聖陶與《倪煥之》，卻不僅呈現了理想與現實、文學與人生的拉鋸，「教育」、「小說」與「教育／成長小說」之間的罅隙，更凸顯彼此辯證中的弔詭。

從歐西「教育小說」的發展看來，「教育小說」與「成長小說」雖然一般都被統攝於「Bildungsroman」一詞之中，但意涵卻不盡相同。大體而言，教育小說（Erziehungsroman）偏屬狹義性地教育（pedagogic），主要涉及接受某些價值或學習某些知識；而成長小說（Entwichungsroman）則以某一中心人物的經驗和成長變化爲小說結構核心。前者偏重技術性，在文化方面是具體的；後者則強調經驗的豐富性，在哲學層面上是廣泛的。儘管如此，須藉由「日常時間性」的敘事來完成，則是異中之同。而被視爲「教育／成長小說」經典之作的歌德《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1796），恰是這兩者的辯證統一——也就是教育目的論的、樂觀的、認識論的時間性，與主人公成長過程的內在個性之間，出現了緊張。然而，經由時間歷程，「教育」（認識論，episemology）與「成長」（存在論，ontology）兩個面向，卻在相互作用和彼此支撐下，共同展現出「永不消逝的生命之樂的光輝」。[49]

另一方面，「Bildungsroman」在十九世紀歐洲的出現，不只是小說形式的改變，也是社會形勢的改變。以一個年輕人的成長，加入中產社會作骨幹，緩緩推演出社會價值的律動和時間改變一切的契機。閱讀這樣的小說，遂成爲讀者加入一個想像的社會共同體的過程。而當它被納入「以小說教小學」、「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的論述脈絡之中，閱讀者同時更是受教者，理當隨著小說主人公的成長學習而完成學習受教的過程，最後不但同樣獲致「永不消逝的生命之樂的光輝」，也將經由此一教育啓蒙，成爲新中國未來的希望。

[49]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弔詭的是，《倪煥之》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第一部長篇教育小說，所敘述的，竟然是教育的不易爲，不可爲。主人公「成長」的最後，非但沒有獲致「生命之樂」，反而以自身的困頓挫折、英年早逝，質疑了曾被寄予厚望的新興教育事業，以及小說本身的教育功能。「青春」不再，「啓蒙」失敗，以「教育」爲目的，導致的卻是「反教育」的結果，這真不能不說是一大反諷了。

但因葉聖陶與《倪煥之》而引發的曖昧性還不止於此。回到葉聖陶本身，葉早年出身舊式教育，年少時曾寫過鴛蝴派的文言小說，新文化運動中幡然轉向，同時致力於新文學與新教育，如此的個人經歷，正是一個從「老少年」轉往「新青年」的典型。[50]此一轉折，曾充分投映在「倪煥之」的成長歷程之中。因此，無論其人其文，都體現了一個去舊迎新的社會化過程。

所不同的是，葉本人婚姻美滿，與夫人胡墨林女士志同道合，長年來共同致力教育文化事業。胡並未因爲結婚生子而放棄理想，葉也未因大革命挫敗而懷憂喪志。三〇年代開始，葉與夏丏尊等人藉由開明書店而開展系列輯編出版工作，他們針對青少年需求編輯雜誌，撰寫語文教材，嘉惠無數學子，流澤廣被，迄今未已。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子女葉至善，葉至美等人，不但沒有成爲父母親教育事業的絆腳石，反都在成長過程中，一併參與並襄助了父母親的事業。[51]「孩童，還是青年？」因此並不曾成爲葉聖陶必須抉擇的兩難。於是，儘管進入革命救亡的時代，儘管文學書寫中的「教育／成長小說」不再，他卻恰恰是以過去一貫的「教育」理念，回應了「反教育」的文學書寫以及社會現實。如此一來，「教育」未必倚恃「小說」，「教育小說」的指向未必就是正面的教育，「青春／啓蒙論述」的發展，也就因此在文學想像與現實人生的頡頏中，憑添無限曖昧，值得不斷關注與再思。

（責任校對：吳品誼）

[50]關於「老少年」與「新青年」的論辯，詳見宋明煒，*Long Live You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 1900-1958*.

[51] 參見葉至善，〈父親長長的一生〉，輯入《葉聖陶集》26，南京：江蘇教育，2004，頁 1-4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王泉根，《現代中國兒童文學主潮》，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浙江：少年兒童，2000。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台北：聯經，2004。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革》，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之五》，臺北：中華，1960。

商金林，《葉聖陶傳論》，合肥：安徽教育，1995。

葉聖陶，《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2004。

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上海文藝，2001。

劉增人，馮光廉編，《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1988。

錢穆，《中國文學論叢》，北京：三聯書店，2002。

Barney, Richard A, *Plots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the Novel in Eighteen-Century England*，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二、論文

（一）一般論文

吳孟班，〈道聽塗說〉，《新民叢報》3號，1902年3月。

宋明煒，〈從「少年中國」到「老少年」──清末文學中的「青春」想像及其問題性〉，未刊稿。

周作人，〈兒童研究導言〉，《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3號，1913年12月15日。

周作人，〈學校成績展覽會雜記〉，《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10號，1914年9月20日。

周作人，〈祖先崇拜〉，《每週評論》第10期，1919年2月23日。

茅盾，〈讀倪煥之〉，《文學週報》第8卷，1929年7月。

夏曉虹，〈吳孟班：過早謝世的女權先驅〉，預訂將刊於《文史哲》2007年2期。

梁啓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10日。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1卷1號，1915年9月15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梅家玲，〈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收入梅家玲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2006。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1期，2001年6月。

葉至善，〈父親長長的一生〉，收入《葉聖陶集》26。

熊月之，〈略論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產生與匯聚〉，《近代史研究》第100期（1997）。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第6卷6號，1919年11月1日。

顏健富，〈「發現孩童」與「失去孩童」──論魯迅對孩童屬性的建構〉，《漢學研究》第20卷2期（2002年12月）。

（二）學位論文

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新竹：清華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4。

Song, Mingwei, *Long Live You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 1900-1958.*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論文，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ldren or Youth? Ye Shengtao's Education Fiction and the Changes in Discourses about Youth and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1920's

Mei, Chia-li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e Shengtao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 of "education fiction." His grand oeuvre *Ni Huanzhi* (1928) has been called "a masterpiece of new literature" by Mao Dun. Most of Ye's works are reflections of his own experience as an educator. The young protagonist in *Ni Huanzhi*, too, throws himself into the cause of education; his growing up and the ensuing disillusionment are thus expression not jus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individual career. Rather, they mirror the multiple changes of discourse about youth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late Qing through the 1920's, as reflected in fictional narrativ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article first of all tracks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images" and "education fic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and their complex relations to the Western *Bildungsroman*. Using the example of Ye Shengtao's "education fiction," the article then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of "youth"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tens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fiction;" finally, it maps the changes of the "youth /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in the fiction of the 1920's.

The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sections:

(1) Ye Shengtao and the problematic of his "education fiction;"

(2) "Youth image" and "education fiction;"

(3) Children or youth? Ye Shengtao's "education fic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youth /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4) Summary: Education or anti-education? Ye Shengtao, *Ni Huanzhi*, and the tension in "youth / enlightenment fiction."

Keywords：Ye Shengtao, Education fiction, 1920's, youth /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